

錦五言十

瑯琊

蒲陽

春眠

眠不覺曉

落知多少

但聞窗外啼鳴

知其蕭然閒適

訪袁拾遺不遇

陽訪才子

陸養濤

編著

真漢濯之

處處聞啼鳥

此先生高隱自得不求門之寓言也言方春暮猶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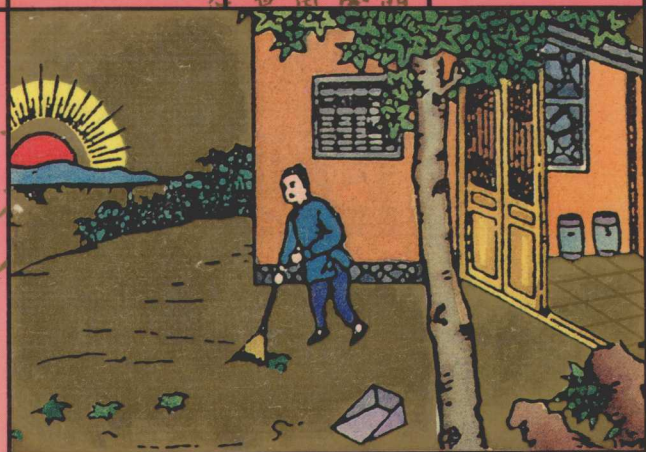
之聲也因想昨宵枕上同

同濟大學出版

知其蕭然閒適之情亦可見矣○孟浩然

江嶺作流人

○浩然訪友不遇而傷其被放而作也拾遺



中國古代蒙學書

大觀

繪圖增註

四明茂

黎明

灑

灑以水灑之則塵不揚

天井也

要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435823

中國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章

中國古代家學書大觀

陆养涛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東坡先生詩集
平益湖
平益湖
固从湖

中國古代家學書大觀

陸養濤

同濟大學出版社



陳從



204358239



责任编辑 曹炽康
装帧设计 陈益平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封面提鉴 陈从周

中国古代蒙学书大观

陆养涛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望亭发电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8.00 元

ISBN7-5608-1607-X/G·165

水滿丹龍鳴滿箭
春生丹陸豐仙桃
光浮御氣龍顏近
殿排祥雲鳳闕高
紫蛟班駟排玉筍
黃麻詔草深霜寒
重露承恩重
烏帽深愁紫二人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二卷

春景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杜子美

五夜聲催曉箭
九春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煙撲滿袖
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
池上子今有鳳毛



散雪春柳四寒時
芳原綠野恣行時
春入蓬山碧四圍

雲松林下宿幽篁
興逐亂紅穿柳巷
困臨流水坐苔磯

鴛鴦花底成詩落
莫醉金酒十分醉
祗恐風花一片飛

良辰正好閑遊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
不妨游衍莫忘歸

杜宇無端侵曉啼



鞦韆春戲

鞦韆 洪覺範

畫架雙栽翠絡偏
佳人春戲小樓前

飄揚血色裙拖地
斷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潤沾紅杏雨
蛛繩斜掛綠楊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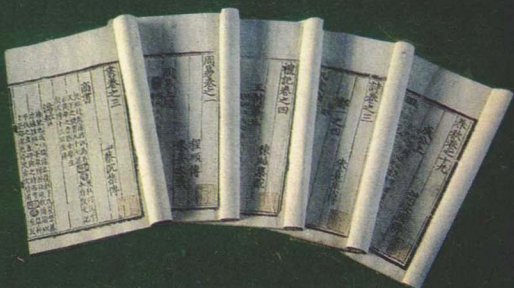
下未闌處從容立
疑是堦官調降仙

釋義 紅輓帶即紅綬帶。見東坡春宵前注。華路
輓帶第三絕句血色味之。美言充拓詩李
紅輓帶拖地之長五字。美說謝道如
上之爲第一句。言聖物之麗足
踴之是極潤活。紅言花物之麗足
踴之是極潤活。紅言花物之麗足
踴之是極潤活。紅言花物之麗足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中国古代蒙学课本



五经《大学》《中庸》《论语》
中国古代的教科书



《蒙汉对照百家姓》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
中国古代的教科书



1904年出版的中小学课本



前言

我国古代编写蒙学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周秦时代，就出现了供儿童识文习字用的蒙学字书，如《史籀篇》、《苍颉》(七章)、《爰历》(六章)等，以后各代都编写过蒙学书。所以从先秦到清代，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留下了这方面大量的材料，也积累了丰富的编写蒙童读物的经验。然而在古代社会，这些蒙学书的地位不能与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以及文人士学的专著相比，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篇章中蕴含了丰富的有关民俗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内容，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因此，对我国古代蒙学书这份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整理和研究。

我国古代蒙学书所以有较大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对儿童教育比较重视有关。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教育。就是在还没有文字的远古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自身繁衍，也离不开传授生产和生活知识的最简单的教育。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特别是文字的出现，教育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儿童教育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也可说是整个教育的起点。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对儿童教育就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甚至对幼儿，人们就开始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品德的培养。所谓的“保傅之教”，就是

对幼儿的教育。儿童到七八岁进入“蒙馆”，接受正式的教育，一直到十四五岁。这一时期的教育阶段被称为“蒙养阶段”。据记载，在先秦两汉时期，蒙养教育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各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蒙馆”。《礼记·学记》里说：“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这里的“塾”、“庠”、“序”就是周代各地所设的“蒙馆”。后来各代，这种教育儿童的蒙馆绵延不断，且不断得到了发展，参加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其名称虽不一，如书馆、书舍、乡学、村学、小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但实际上都是儿童开蒙受业的受教育的场所。蒙馆的设置，必然要求与之相配的蒙学教材。所以，随着蒙馆的设置与发展，蒙学教材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宋代以后，教育的对象扩大了，除封建地主阶级外，手工业者、商人等庶民阶层，也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要求他们的子弟进入蒙馆，并已有条件接受蒙养教育。这就促进了蒙学教育，也必然使蒙学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

其次，当时许多官吏、著名学者参与编写蒙学书，也是它得到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上面所说的《史籀篇》的编写者是周宣王时的史官太史籀，《苍颉》（七章）是秦代丞相李斯所编，《爰历》（六章）的编写者是秦相赵高。再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到宋代的欧阳修、朱熹、吕祖谦等著名作家、学者都编写过蒙养教材。在蒙书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要算《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了，其中《百家姓》的作者不详，而《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周兴嗣，《三字经》的编者是南宋王应麟，他们均为当时的著名学者。这些掌有朝柄大权的官吏和享有盛名的文人学士直接编写蒙学书，自然提高了蒙学书的声誉，扩大了蒙学书的影响。

第三,印刷术的发明,对蒙学教材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隋唐时期,我国就出现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为刻板,在上面刻字,然后即可大量印刷。这种方法,成本低廉,木刻工艺简单,印刷便捷,较过去的手写传抄优越得多,因而深受人们欢迎。雕版印刷在当时就用于印制蒙学书。据载当时雕版印刷的书籍中不少为“术数、字学、小学”之类的蒙学书(见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到北宋仁宗时,毕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这种方法比雕版印刷又大大进了一步,它更为灵活方便,既节省费用又能缩短时间,加快了书籍的印刷,是印刷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活字印刷用于印制蒙书,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蒙童读物的发展,并使其得到更快、更广泛的传播。

由于历史久远,加上过去对蒙学教育记载很少,蒙学书被认为是孩童读物,不为一般藏书者所重视,所以很多亡佚,现在所存的仅为其中的一部分。但从中也可使我们对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从现存的材料看,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周秦到隋唐为第一个阶段,从宋代到清中叶为第二个阶段,从清中叶到民国初年为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周秦到隋唐。这时期的蒙学书大多为综合性的教材。这些教材既是以教育儿童识字、掌握文字工具为主要目的,同时还对儿童进行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等方面的教育。

(一)周秦到两汉时期。早在周代就有了专供儿童识字、习字用的蒙学字书,《史籀篇》便是见之于史册所载的最早的蒙

学课本。《汉书·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以后相继出现了《苍颉》(七章)、《爰历》(六章)，以及胡毋敬的《博学》(七章)。汉初，间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本，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统称《苍颉篇》。此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管仲的《弟子职》、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班固的《续训纂篇》和《太甲篇》等不下数十种，其中流传时间最长，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急就篇》为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撰。唐颜师古在《急就篇》注本上说，该书“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这说明《急就篇》是一本综合性的教材。《急就篇》共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据前人考证，最后一百二十八字为东汉人所加。《急就篇》有三言、四言、七言，全篇叶韵。开头部分以三言陈说姓氏，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接着用七言按类分别介绍各种物品，包括丝织品、动植物、农产品、乐器、人体器官、药物等等；最后用四言“汉地广大，无不容盛，边境无事，中国安宁”作结束。它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种用韵语把日常用的字分类汇编在一起，既便于儿童记忆，又切合应用。后来的蒙学书《百家姓》、《三字经》、《史姓韵编》、《名物蒙求》等，都继承了这种编写方法，可说是《急就篇》的发展。自汉至唐，《急就篇》被广泛采用，成为儿童通用的主要识字课本。明代顾炎武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日知录》)章太炎说：“《急就篇》‘泛施日用，尤便于间里书师。’”(《论篇章》)可见其流传之久，影响之大。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除前代一些蒙学书，如《急就

篇》继续流行之外，又编写了多种蒙学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千字文》。《千字文》为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全文千字，每句四字，共二百五十句，通篇叶韵。内容包括天文、历史、地理、动物、植物、农业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据记载，梁武帝命人拓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无重复的一千个字，接着命周兴嗣将其编撰成文。《尚书故实》载：“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撰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千字文》只用了有限的本不相关的一千个字，一夜就组织成通顺的表达了丰富内容的二百五十个句子，且全篇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押韵自然，对仗工整，确实令人惊叹。清人褚人获说：《千字文》“于有限之字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坚瓠集》）。《千字文》编成后，很快就流传各地，而且流传时间甚长，自唐宋以后一直被广泛采用作为蒙童识字教材。《千字文》还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旧时商人帐册、考场试卷以及一些大部头书籍卷册的编号等，也常用《千字文》的字序为次序。这些足以说明其影响之大。《千字文》不仅在汉民族中流行，而且在少数民族中也得到了流传，出现了汉蒙、汉满的对照本，还曾流传至日本，出现了日本的《千字文》刻本。一本蒙童识字教材，流传的时间这么长久，影响这么广泛，这在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除《千字文》外，还有陆机的《吴章》，束晰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颜延之的《庭诰》、《诂幼》等多种蒙书；另外还有几种杂字书，如郭显卿的《杂字指》，李少通的《杂字要》、《俗语难字》等。

（三）隋唐五代时期。这时期也有多种蒙学书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开蒙要训》，著者不详，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的几页残片。《开蒙要训》编法

和《千字文》相近，也是四言为句，全篇叶韵。以教育儿童识字为主要目的，同时教以各种物品名称等知识。它没有《千字文》那样流行，但直到五代还在被传抄，可见它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除外是杜嗣先的《兔园册》（亦作《兔园策》或《兔园册府》），此书已亡佚，现只残存半篇序文。据近人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兔园策府残卷提要》载：“宋史艺文志有杜嗣先兔园册三十卷。……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王伯厚困学记闻云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则此书盛行于五代，或至宋季尚存。”但也有说此书是唐虞世南所作，如宋人晁公武说：“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俚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兔园册》是以对偶骈体文字，分门别类叙述一般知识。据宋初孙光宪说：“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兔园册》乃徐庾文体”（孙光宪：《北梦琐言》）。可见，《兔园册》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用骈体文写的蒙童教材。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编写蒙学书，在教儿童识字的同时，使他们掌握各种掌故知识，《兔园册》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后来李翰的《蒙求》以及明清以下广泛流行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都是沿着《兔园册》发展而来的。《蒙求》的作者李翰，其生卒不详，一说是唐代人，一说是五代后晋人，但多数认为是唐代人。《蒙求》四言一句，五百九十六句，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全文叶韵，易诵易记。它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二句一联，各讲一个历史典故，蒙童从中可学到许多历史知识。此书曾广泛流传，甚至远传至朝鲜、日本。除上述三种蒙书外，在唐代，影响较大的蒙学教材还有《太公家教》，著

者不详。此书在唐时较为流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王重民在《跋太公家教》中说：“是书译本，自女真而高丽而满洲，五百年间历为东北说各种语言之童蒙读本。而中原自采用《三字经》、《百家姓》之后竟至亡佚。”可见当时《太公家教》是一本较为流行的蒙童读物。到清末宣统年间《太公家教》在敦煌被发现，罗振玉收在《鸣沙石室佚书》中。《太公家教》多数为四言一句，大量汇集了古书上的引录、流行的格言、俗说、谚语。其中有些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等，但通观全篇却充满了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和安分守己、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太公家教》从写作特点而言，可说是开了后来汇格言、民谚、成语一类蒙书，诸如《名贤集》、《昔时贤文》的先河。从这一点上说，《太公家教》的历史地位是不可被忽视的。

第二阶段，从宋到清中叶。这时期的蒙学书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不仅内容更加丰富，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在编写方法上由唐以前都是综合编写向分门专类编写发展。这种变化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它也符合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教育对象的扩大，教育内容必然增加，课程范围必然扩大，从而要求教材有所分工和侧重。这反映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自宋以后，除继续出现综合性的蒙学书外，还出现了分门别类编写的如道德教育类、历史知识类、人物掌故类、名物常识类、诗歌辞赋类等的蒙学教材。

综合性的蒙学书最为有名的当推《三字经》。这是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蒙学书。相传为宋末大学者王应麟(字伯厚)所作，也有说是宋末区适子所作，但多数认为其作者

是王应麟。《三字经》在其流传过程中，也有多人增补，如原来其历史部分只写到宋代，金辽以下是明清人士增补的。现在比较通行的明末清初人王相的注本写到明末：“迨崇祯，煤山逝。”后来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一直补到清末：“十二世，清祚终。”还增加了其它一些内容，近三分之一。《三字经》文字极为简炼，内容高度概括，且全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因而在一千多字的有限文字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三字经》采用三言体，有的三字成句，有的六字成句，也有的十二字成句，句句叶韵。这种句式短小整齐，叶韵自然，读来琅琅上口，所以极易为儿童背诵记忆。加上它内容丰富博大、结构严谨、条理分明、层次清楚，就自然使其成为一本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王应麟是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均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著作颇多，有《深宁集》、《玉堂类稿》、《困学记闻》、《玉海》等，是一位忧时爱国、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大学问家。由他来编写供儿童学习的启蒙教材，实在难得。自《三字经》问世后，即有多种《三字经》注本和增补本，还出现了不少仿效《三字经》格式的蒙书，如《三字孝经》、《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三字鉴》等。《三字经》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编成《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等，在少数民族中流传，足见其影响之大。

《百家姓》是和《三字经》同样有名的古代蒙书，其作者不详。明人朱国桢说：“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朱国桢：《涌幢小品》）。宋王明清也说：“《百家姓》”“其首云：‘赵、钱、孙、李’，……赵乃本朝国姓”（《玉照新志》）。这些说明《百家姓》的作者当是宋代

人。《百家姓》到南宋时已相当流行，被广泛作为儿童的识字教材。《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式整齐，且注意叶韵，因此它虽是没有意义的只表示姓氏的五百多个单字的堆积，但读来琅琅上口，儿童易诵易记。《百家姓》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因为到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高度成熟，其内部出现了商品经济，市场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人们的交往必然增多，因此人们通过读书识字，了解一下社会众多姓氏，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些正是《百家姓》得到广泛流行，以至和《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的原因。《百家姓》问世后，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也有各种改编本，如明黄周星编的《百家姓新笺》，明吴沉、刘仲质编的《皇明千家姓》，到清代更有号称康熙编的《御制百家姓》等。但正如《千字文》和《三字经》那样，各种改编本都未能取代原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依然是旧本《百家姓》。

道德教育类的蒙学书 在宋代以后这类蒙学书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和理学的盛行有关。本来封建社会的教育总是把封建道德、纲常伦理作为其中心内容，并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到宋代以后由于理学盛行，理学家们都十分重视教育，而且竭力把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注入教育中去，许多理学家还亲自编写蒙学教材，因此宋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道德教育类的蒙学教材，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明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程若庸的《性理字训》等。这类蒙学书中最受理学家推崇的是宋代朱熹编的《小学》，全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组成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里面除了直接说教的话之外，也有不少格言、故事，

还包括一点名物知识。但由于说理深奥，多引古圣和难字，因此尽管当时被广为刻印，多被注释，也未能广泛流传。正如陆世仪所说：《小学》“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论小学》）。而流行较广的则是较为通俗的《名贤集》和《增广昔时贤文》，它们的作者均不详。《名贤集》汇集孔、孟以来历代名人贤士的话语以及格言、成语等，文字通俗，句式对偶整齐，有的四字成对为句，有的五字成对为句，有的七字成对为句，注意叶韵，读来顺口，故易诵易记。《增广昔时贤文》中有许多句子已家喻户晓，如“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等。由于它文句比较通俗，有许多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经验的，所以一般农家子弟、小工商业家庭子弟多以此与杂字书相配作为教材。

李毓秀的《弟子规》是清代以后道德教育类蒙学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蒙学教材。此篇语句比较好懂，且采用了很有影响的《三字经》的体例，成句自然，叶韵顺口，其内容又是对蒙童学子进行直接的品德修养、行为规范的教育，因此很受社会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的流行。清人周保障在《童蒙记诵编》中曾说：“近李氏弟子规盛行；而此书（指王应麟的《三字经》）几废。”可见其影响之大。

历史知识类蒙学书 宋代以后出现了专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的蒙学书。这可分两种，一是断代性的，只叙某一朝代的历史；一是通史性的，从上古一直叙述到当代或前一二代。前者如宋代胡宏的《叙古蒙求》和邹彦春的《春秋蒙求》，以及在后来相继出现的《西汉蒙求》、《两汉蒙求》、《三国蒙求》、《南北

史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后者如宋黄继善的《史学提要》、明赵南星的《史韵》、明末清初许遯翁的《韵史》、清初王仕云的《鉴略四字书》等，都是这类蒙学书中较有影响的著作。历史知识类蒙学书由于语言精炼、句式整齐、叶韵上口、便于诵读记忆，所以对传播历史知识起了很大作用。

历史典故类的蒙学书 这类蒙学书继承了唐代杜嗣先《兔园册》和李翰《蒙求》的编写特点，常常引用大量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汇编成书，但有的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内容十分广泛，简直像个知识小百科，对丰富人们的知识有很大的作用。宋代以后，这类蒙学书很多，成为整个蒙学教材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明萧良友撰、杨臣诤增订的《龙文鞭影》和明程登吉撰、清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前者吸取前代蒙求书以及古代神话、小说等书里的材料，以四字一句编纂成文，内容丰富，而且注意叶韵，读来流畅顺口，所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后者除记述历史典故等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岁时、鸟兽、花木、父子、兄弟、夫妇、师生等共三十多个门类的知识，内容极为丰富，使人既能从中得到历史方面的知识，又能学到不少生活常识性的知识。《幼学琼林》语言也较简炼，读来也还顺口，加上内容的广泛性，有许多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因此广为流传，特别是清代以后更是风行全国。

物名常识类的蒙学书 这类蒙学书以介绍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事物的名称为主。这对儿童及早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有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这本蒙童读物介绍了天文、地理、鸟兽、花木、衣服、建筑、日用器物、耕种操作，以及当时社会上亲属家庭关系的

种种名称。全文共二千七百多字，用四言体，注意叶韵。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清代徐继高的《算学歌略》、张士瀛的《地球韵言》等。

诗歌歌诀类的蒙学书 教育儿童吟咏一些浅近优美的诗歌，不仅可以培养他们的情趣，而且可以提高他们阅读文学作品和写作的能力，也是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需的。因此，古代蒙童教育十分重视诗歌类的蒙学教材，自唐宋以后诵读诗歌已成为蒙童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诗歌类蒙童读物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唐代胡曾的《咏史诗》开了这类蒙学书的先河。它包括一百余首以历史为题材的七言绝句，流传于五代至宋。宋以后，诗歌类蒙学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为流行的当推《神童诗》和《千家诗》。《神童诗》为宋代汪洙所作。据明人朱国桢说：“汪洙，字德温，鄞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黄官，见殿字颓圯，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世以其诗增补成集，以训蒙学，为《汪神童诗》”（《诵幢小品》）。其实，《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其中不少杂采他诗论补。全集分幼学、状元、言忠、帝都、四喜、早春、春游、暮春、寒食、清明、纳凉、秋夜、中秋、秋凉、七夕、登山、对菊、冬初、季节、除夜等二十类。这些诗全为五言，篇幅短小，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叶韵和谐，这些对儿童学习诗歌，提高对诗歌的兴趣，掌握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是有积极作用的。《千家诗》也是极为流行的进行诗教的蒙学教材。据载宋刘克庄曾编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后人谢枋得在此基础上选编成《重订千家诗》，收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一百多首；又有清人王相也在刘编本的基础上选编了《新镌五言千家诗》，收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八十多首。这两种